

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分离^{*} ——基于契约理论的一种解释

周晓苏, 唐雪松

(南开大学 商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文章从企业契约视角解释了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分离的原因。企业作为契约而存在,会计系统在企业契约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分析股东—经理管理契约在不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下的结果表明,股东、经理在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要求上存在冲突,原因在于不同信息质量特征下双方的效用不同。除此之外,借贷契约、公共产品和税收契约、劳务契约以及其他契约的各方主体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均存在冲突。正是这些冲突,导致了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分离。

关键词:会计信息;契约;相关性;可靠性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6)11-0135-09

一、导言

会计的目标在于向企业利益相关人提供对投资、融资、监管等决策有用的信息。利益相关人包括股东、经理、雇员、银行、公众、政府、供应商和客户等,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直接影响到利益相关人的决策。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最具代表性的阐述出自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二号“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SFAC NO. 2),该公告以财务报告目标为起点,提出两条最基本的质量特征:相关性(relevance)和可靠性(reliability)。相关性是“信息影响决策的能力”,包括信息的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可靠性是“它反映了它意在反映的经济情况或事项”,分为反映真实性、可核性和中立性。在改善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中,相关性和可靠性并不一定同时改善,有时甚至两者是相互冲突的,信息质量到底有所得抑或有所失,可能并不清楚^①,例如1982年FASB颁布的SFAS 69所要求的储备确认会计(RRA)所造成的信息质量后果。因此,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两者不可兼得一直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收稿日期:2006-08-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472051)

作者简介:周晓苏(1952—),女,四川资中人,南开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雪松(1976—),男,四川仪陇人,南开大学商学院会计学博士生。

William R. Scott(1997)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会计信息在相关性与可靠性上的矛盾。他认为投资者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同时控制这两个问题时会产生一个结果:保证投资者获得有效决策的信息不一定会激励经理人员,也就是说虽然控制了逆向选择,却不一定控制道德风险。对投资者最有利的信息是相关性与可靠性相权衡的信息,对管理人员最有利的信息是与他们经营努力程度高度相关的信息。由于只有一个会计盈余数字,这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会计理论的基本问题。朱元午(1999)从相关性、可靠性是两个含义不能确指的模糊概念出发,认为人们在对信息的有用性的不断追求上正面临着相关性和可靠性的两难选择,相关性与可靠性并非总是在同一方向上影响信息的有用性。叶有忠(2000)从成本效益角度探讨了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以此说明会计信息质量的两难选择,进而提出从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不同的期望目标的内在差异性入手,建议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促进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质量目标的动态平衡。夏冬林(2004)从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时间角度进行探讨,认为相关性和可靠性本质上是一个时间问题,分析了相关性和可靠性两难选择的原因,如果确认会计事项的时间越早,会计信息披露越及时,会计信息越具备相关性,但不确定牲越高,从而可靠性越差;反之,如果确认和披露时间越晚,则相关性越差,但可靠性越高。

与前述文献不同,本文拟从企业契约的视角解释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分离的原因,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契约各方主体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存在冲突,从而导致了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分离。文章余下部分依次安排为第二部分论述了作为契约的企业与作为契约履行机制的会计系统;第三部分分析了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分离——以股东—经理管理契约为例;第四部分探讨了其他契约对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影响;最后部分为结语。

二、作为契约的企业与作为契约履行机制的会计系统

根据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Anexus of Contracts)。契约,也称协议、合约或者合同,法律上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②,“契约是指两人或多人之间为在相互间设定合法义务而达成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③;经济学上契约是所有的市场交易关系。企业契约既包括“显性契约”,也包括“隐性契约”(Zingales, 2000)。与古典、新古典契约理论不同,现代契约理论划分了完全契约(A Complete Contract)和不完全契约(An Incomplete Contract),认为企业契约具有三个特性:(1)企业的合约性(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2)合约的不完全性(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Contracts);(3)以及由此导致的所有权的重要性(Relevance of Ownership)(张维迎,1996),其中,“合约

的不完全性”是关键性命题,企业的契约性只有在说明了“合约的不完全性”之后才有意义。如果企业的一系列契约都是完全的,则所有权的配置就不重要,也不存在常说的企业代理和治理问题,而“所有权的重要性”则是“合约的不完全性”的推导结果。契约存在不完全性的原因在于(Schwartz,1991)。

(1)一个契约有时因为语句是模棱两可或不清晰而可能造成契约的模棱两可或不清晰;(2)由于契约方的疏忽未就有关的事宜订立契约,从而一个契约是不完全的;(3)因为契约方订立一条款以解决特定事宜的成本超出了其收益而造成了一个契约是不完全的(Shavell,1984);(4)一个契约可能由于不对称信息而是不完全的;(5)只要至少市场的一方是异质的,且存在足够数量的偏好合作类型,则契约就是不完全的。

企业与市场分别是不同性质的契约,市场可认为是一种完全的契约,而企业则是不完全的契约(Crossman 和 Hart,1986)。除股东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回报都可在企业契约中明确,不能得到契约明确规定回报的股东则获得对企业剩余的索取和控制。因而,所谓企业所有权,有别于财产所有权,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简称(张维迎,1996)。

进一步分析,企业可理解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契约(周其仁,1996)。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经济活动产生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所有权每时每刻都属于作为它载体的人,不能分割、转让,“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个人”,而除此之外的一切资本都是非人力资本。现代契约理论十分强调非人力资本在契约中的作用,是非人力资本吸引粘合人力资本而不是相反,企业契约是关于非人力资本的契约的派生和依附(费方域,1998)。

各类资本提供者为了获得利益而参与企业契约。某个主体付出资源获得利益的方式、数量、质量和时间等是相关主体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契约主体包括股东、经理、债权人、职工、顾客、供应商、审计师、政府等,其中,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契约是最重要的契约,它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企业的其他契约才能发生。

会计系统作为企业契约履行机制而存在^④。会计系统提供有关契约主体的事项和行动的信息,而且为相关契约提供结构要素,具体而言(Sander,2000):(1)它计量各个主体对企业资源集合的投入;(2)它确定并支付每个主体的约定利益;(3)它把其他主体履行约定义务和获取约定利益的情形告知相关的主体;(4)它帮助维持企业生产要素提供者流动的市场,从而使企业不会因一个契约主体的辞职或届满而终止;(5)由于多方主体的契约是分期商定的,它向所有参与者提供经证实信息的共同知识,以便进行协商和签订契约。会计系统的产物——会计信息对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言其实意味着“权利”(杜兴强,2002),其信息规则和产权是契约各方主体博弈的结

果。由于会计系统所依托或服务的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因此,会计信息会影响企业契约的实际执行与结果。

三、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分离——以股东—经理管理契约为例

在所有企业契约中,股东—经理管理契约最为重要,股东和经理分别投入非人力和人力资本。股东向企业投资后不能随意撤资,从投资到收回投资需要较长时间,而且收回投资的方式也是特定的,即股东对企业契约做出了事先的承诺,并在投资后成了被动的旁观者(Sunder,2000),但这种不利局面却由于股东拥有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有所扭转。作为剩余索取者,股东对“剩余”的确认和计量高度敏感。与此相对应,经理投入人力资本,在企业的价值创造中表现为各种专用性服务和非专用性服务(费方域,1998),这些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难以直接衡量。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博弈中根据经理控制范围内可观察的产出来设计经理参与企业的契约,即管理契约。管理契约通常是自我履行性契约(Telser,1981),它将经理与股东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具有激励经理和降低直接计量经理贡献的成本的作用。会计系统在股东—经理契约中计量股东的原始资本投入,确定企业的“剩余”收益,确认以红利形式返回给股东的“剩余”,帮助在现有股东和潜在股东之间形成一个流动的持久的市场;同时,会计系统通过企业“剩余”形式提供衡量经理能力和义务履行情况的基础,确认并计量支付给经理的报酬,为经理人市场提供企业相应职位和经理的信息。

股东—经理契约是不完全契约,该契约只是构造了股东和经理的关系框架,确立了主要目标,但对企业经营中的具体细节、经理未来的具体报酬、乃至具体冲突的处理办法是很少详细规定的。在此框架内,经理利用其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并基于企业“剩余”创造结果获得报酬;股东拥有“剩余”索取权,享有“剩余”,并可在企业“剩余”目标未实现、经理行为超出契约框架或违反法律等异常情况下使用剩余控制权予以纠正或禁止。具体而言,股东的剩余控制权的行使包括股东大会行动、大股东直接行动、董事会行动、代理权争夺、接管等(费方域,1998)。可以看出,会计系统所确认的“剩余”在股东—经理契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剩余”的确认又受到会计信息不同质量特征的影响。可以预期,股东与经理对于会计信息的不同质量特征会有不同的偏好,对于具有不同相关性或可靠性的会计信息也会有不同的偏好。由于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在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上的不同特点,在下述简单模型中我们以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计价原则为例进行分析。

1. 假设

假设经理的效用 U_m 由效用 $U_1(x)$ 和 $U_2(a)$ 两部分组成, $U_m = U_m(x, a) = U_1(x) + U_2(a)$, 其中 x 为经理的货币性收入, a 为经理对企业的控制权, 并且, x, a 分别为企业会计利润 E_b 的函数, 假定 $dx/dE_b > 0$, 控制权 a 定义为:

$$a \sim a(E_b) = \begin{cases} A_1 & E_b < E_0 - d \\ A_2 & E_b \geq E_0 - d \end{cases}$$

其中, E_0 为经理与股东在契约达成时所确定的目标企业利润, d 为一正实数, A_1, A_2 分别为正实数, 且 $A_1 < A_2$ 。

因人力资本不能以资产组合方式持有进行风险分散化, 假定经理对于货币性收入规避风险, 即 $U_1(x)$ 为凹函数, 也即 $U'_1(x) > 0, U''_1(x) < 0$, 并假定 $U_2(a)$ 单调递增。

股东与经理契约约定期限结束时, 企业的会计利润为:

$$E_b = \begin{cases} E_r + \zeta & \text{历史成本计价原则} \\ E_r + \eta & \text{公允价值计价原则} \end{cases}$$

其中, ζ 服从区间 $(-m, m)$ 均匀分布, η 服从区间 $(-m-n, m+n)$ 均匀分布, m 与 n 均大于零, 则有 $E(\zeta) = E(\eta) = 0, 0 < \sigma_\zeta^2 < \sigma_\eta^2$, 也就是说, 在历史成本或者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下, 企业会计利润受到的随机扰动的期望是一样的, 但在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下, 会计利润的波动性更大。其中, $E_r = f(e) + \epsilon$ 为企业的实际利润, 是经理努力程度 e 的函数加上一个随机扰动项 ϵ , ϵ 服从区间 $(-w, w)$ 均匀分布, $w > 0$ 。

可以合理假定 $E_0 = E(E_r)$, 因为股东与经理在契约谈判时可以使之成立。由于企业经营中存在诸多不受经理控制的非主观因素, 为了减少股东频繁地或非合理地因目标利润未完成而采取剩余控制权行动介入企业具体经营过程所造成的机会成本, 股东—经理契约在企业利润上给予经理一个安全边际 d , 所以, $E_0 - d$ 为经理丧失企业控制权的临界点。

假设股东效用函数为 $U_s = U_s(y, b) = U_a(y) + U_\beta(b)$, 其中 y 为股东所享有的货币性收入——企业“剩余”, b 为股东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 y, b 分别为企业会计利润 E_b 的函数, 且 $dy/dE_b > 0$, 则有:

$$b \sim b(E_b) = \begin{cases} B_1 & E_b < E_0 - d \\ B_2 & E_b \geq E_0 - d \end{cases}, \text{其中: } B_1 > B_2。$$

假设股东对货币性收入持风险偏好态度, 即 $U_a(y)$ 为凸函数, 也即 $U'_a(y) > 0, U''_a(y) > 0$, 并假定 $U_\beta(b)$ 单调递增。

2. 推导结果

由于经理效用函数 $U_m = U_1(x) + U_2(a)$ 可以分为货币性效用和控制权效用两者效用之和, 故可将两者分开讨论。

对于经理货币性效用部分 $U_1(x)$, 分别计算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下的经理货币性效用期望 $E(U_1(x(E_r + \zeta)))$ 和 $E(U_1(x(E_r + \eta)))$ 。根据 $E(E_r + \zeta) = E(E_r + \eta)$, 且因 $U_1(x)$ 为凹函数, 可得⁵:

$$E(U_1(x(E_r + \zeta))) > E(U_1(x(E_r + \eta))) \quad (1)$$

对于经理控制权效用部分 $U_2(a)$, 为了比较 $U_2(a)$ 在两种计价原则下的

大小,需比较两种计价原则下的概率 $p(E_b \leq E_0 - d)$ 。由已知条件可得^⑥:

$$p(E_r + \zeta < E_0 - d) = p(E_r + \eta < E_0 - d) \quad (2)$$

即在两种计价原则下,经理因企业未达到目标利润而丧失企业控制权的概率相等。由 $a(E_b)$ 函数定义可得:

$$E(U_2(A(E_r + \zeta))) = p(E_r + \zeta < E_0 - d)A_1 + p(E_r + \zeta \geq E_0 - d)A_2 = p(E_r + \eta < E_0 - d)A_1 + p(E_r + \eta \geq E_0 - d)A_2 = E(U_2(A(E_r + \eta))) \quad (3)$$

由(1)式、(3)式可得:

$$E(U_1(x(E_r + \zeta)) + U_2(A(E_r + \zeta))) > E(U_1(x(E_r + \eta)) + U_2(A(E_r + \eta)))$$

所以,在历史成本计价原则下经理的效用期望值更高,经理更加倾向于使用历史成本计价原则。

与经理效用类似,股东效用 $U_s = U_a(y) + U_\beta(b)$ 也可分为货币性收入与剩余控制权效用两部分,故分开讨论。

对于股东货币性收入效用 $U_a(y)$ 分别计算在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下的股东货币性效用期望 $E(U_a(y(E_r + \zeta)))$ 和 $E(U_a(y(E_r + \eta)))$ 。根据 $E(E_r + \zeta) = E(E_r + \eta)$ 以及 $U_a(y)$ 的性质,可得^⑦:

$$E(U_a(y(E_r + \zeta))) < E(U_a(y(E_r + \eta))) \quad (4)$$

对于股东剩余控制权效用 $U_\beta(b)$,由(2)式和 $b(E_b)$ 函数定义可得:

$$E(U_\beta(B(E_r + \zeta))) = p(E_r + \zeta < E_0 - d)B_1 + p(E_r + \zeta \geq E_0 - d)B_2 = p(E_r + \eta < E_0 - d)B_1 + p(E_r + \eta \geq E_0 - d)B_2 = E(U_\beta(B(E_r + \eta))) \quad (5)$$

由(4)式、(5)式可得出:

$$E(U_a(y(E_r + \zeta)) + U_\beta(B(E_r + \zeta))) < E(U_a(y(E_r + \eta)) + U_\beta(B(E_r + \eta)))$$

所以,在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下股东的效用期望值更高,股东更加倾向于使用公允价值计价原则。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股东、经理出于各自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求上存在分歧,经理倾向于历史成本计价原则,而股东则倾向于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下的会计信息。产生分歧原因在于两种计价原则下会产生不同质量特征的会计信息,历史成本计价原则下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更高,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下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更高,这种差异导致了企业会计利润波动性的差异,也即股东—经理契约中关键性要素——企业“剩余”的波动性差异,从而引起双方效用特别是货币性效用在不同计价原则下的差异。但需要指出,上述模型也表明了不同计价原则不会影响企业达到目标利润的概率,股东因企业未达到目标利润而采取剩余控制权的概率不会受到企业会计政策的影响。

此外,还存在一些重要因素影响到上述模型的结论,需要逐一说明。

(1)企业会计利润 E_b 的真实性。前述模型中企业会计利润 E_b 的真实性对于股东—经理契约的实际执行具有重大影响。如果 E_b 受到经理操纵而是虚假的,股东剩余控制权将不能正常发挥。在前述模型中假定 $E_b = f(e) + \zeta/\eta + \epsilon$,即企业

会计利润仅受到经理努力程度、会计计价原则和随机干扰项的影响。这样处理是有根据的:会计利润 E_b 的真实性可以通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加以保证^⑧。

(2)经理货币性收入 x 与企业会计利润 E_b 的关系。在前述分析模型中,将经理货币性收入 x 与企业会计利润 E_b 的关系假定为 $dX/dE_b > 0$,这样处理是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理论上,通过这种关系将经理的货币收入与企业利润挂钩,使经理分享企业利润,由此可以达到激励经理的目的。现实中也存在大量的企业将经理的货币收入与企业利润挂钩的做法。

四、其他契约对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影响

除股东—经理管理契约之外,企业还存在其他契约。债权人与股东签订借贷契约,债权人向股东投入借贷资本,出让债权期限内的资本使用权,并到时收受利息和本金;股东在债务期限内使用资本,并负有按时支付利息和归还本金的义务。借贷契约中常对会计处理原则、方法以及某些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财务指标进行约定,并要求企业披露相应的会计信息。如果股东到期不能支付利息、偿还本金或出现所约定的财务指标超过规定界限等异常情况,债权人将可以接替股东行使企业的控制权,并享有索取权,也即对企业的相机控制权(Zender,1991)。债权人行使相机控制权的方式包括申请破产、债务重组等。可以看出,作为债务契约履行机制的会计系统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对债权人效用具有重要影响,有理由预期,及时的、相关的会计信息将提升债权人的效用,结合前述模型,债权人偏爱公允价值计价原则甚于历史成本计价原则;相对应地,稳定的、可靠的会计信息将提升股东的效用,与债权人相比,股东偏爱历史成本计价原则甚于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于是,债权人与股东在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上产生分歧。

政府与股东就公共产品和税收达成契约关系。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享有征税的权力,并拥有对除税收之外违法行为进行惩戒的权力;股东享用共同物品,但须依法经营并按时交纳税金。在契约关系中,企业的收入、利润等信息是征税、违法惩戒的重要依据。因此,政府要求企业提供可靠、可核实的会计信息,这与股东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必然存在冲突。雇员与股东就劳动力提供达成劳务契约,企业的利润情况对于劳务报酬有重要影响,而具有不同相关性和可靠性的会计信息会导致不同的利润,进而导致股东、雇员在契约履行中不同的行为和效用。因此,股东和雇员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存在冲突。此外,还有股东与供应商、顾客、公众之间的契约,不一而足,但需要说明的是,各契约主体由于不同质量特征的会计信息而享有对企业不同的权益要求以及不同的效用,正因为这些不同,导致了会计信息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上的分离。

需要指出的是,可能存在同一主体在不同契约中对会计信息质量有不同的要求,如在股东—经理管理契约和股东—债权人借贷契约中,股东在前者中

倾向于相关性高的会计信息,而在后者中倾向于可靠性高的会计信息,这就要求相关契约主体进行权衡取舍,以使自身综合效用最大化。但契约各方最终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仍然存在冲突,从而导致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分离。

五、结语

文章从企业的契约性入手,在分析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作为契约履行机制的会计系统在契约中发挥作用的基础上,以股东—经理管理契约为例建立模型,利用在相关性与可靠性上存在差异的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价原则,分析了股东、经理为了各自效用最大化目标所进行的最优选择。分析结果表明,股东、经理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求上存在分歧,股东倾向于相关性高的公允计价原则,而经理则倾向可靠性高的历史成本计价原则,究其原因在于不同信息质量特征的会计利润的波动性不一样,进而导致双方效用的差异。除此之外,借贷契约、公共产品和税收契约、劳务契约以及其他契约的各方契约主体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均存在冲突。正是这些冲突,导致了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分离。

* 本文为周晓苏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数据挖掘的企业业绩评价与分析模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 ①参见 FASB:《论财务会计概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8 页。
- ②参见《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第 1101 条,转引自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③参见《牛津法律大词典》,转引自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④履行契约的系统还包括普通法、民法、刑法以及执行和审判系统,以及社会文化准则等,可参见 Sander:《会计与控制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⑤⑥⑦因文章篇幅限制,证明略,有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 ⑧本文认定注册会计师是称职尽职的。注册会计师能力缺陷和舞弊不在讨论范围。

参考文献:

- [1]FASB. 论财务会计概念[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 [2]Grossman Sanford J, Hart Oliver D. The cost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691 ~719.
- [3]Schwartz A, Scott R E.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M]. Mineola: Foundation Press, 1991.
- [4]Shavell S. The design of contracts and remedies for breac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 (99): 121~48.
- [5]Sunder, Shyam. 会计与控制理论[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 [6]Telser, Lester. A theory of self-enforcing agreement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81,

- (53):27~41.
- [7]William R Scott. 财务会计理论[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 [8]Zender J. Optimal financial instruments[J]. Journal of Finance,1991,(46):1645~1663.
- [9]Zingales L. In search of new foundation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0,(4):1623~1653.
- [10]杜兴强. 会计信息产权的逻辑及其博弈[J]. 会计研究,2002,(2):52~58.
- [11]费方域. 企业的产权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12]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 契约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 [13]夏冬林. 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及其特征[J]. 会计研究,2004,(1):20~27.
- [14]叶有忠.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及其两难性选择[J]. 华东经济管理,2000,(3~4):42~44.
- [15]张维迎. 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J]. 经济研究,1996,(9):3~15.
- [16]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 经济研究,1996,(6):71~80.
- [17]朱元午. 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和可靠性的两难选择——兼论我国现行财务报告的改进[J]. 会计研究,1999,(7):9~14.

The Divergence of Relevance and Reli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 Explanation from Contract Perspective

ZHOU Xiao-su, TANG Xue-song

(School of Busines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Using contract theor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divergence of relevance and reli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 firm is Anexus of Contracts, and its accounting plays great role in contracts. The different results of owner—manager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under different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how that the owner and manager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to relevance or reliability due to their different utilities under each circumstance. Besides, the contractors of loan contracts, public—tax contracts, and labor contracts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to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All of these preferences give reasons to the divergence of relevance and reliabi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Key word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ontracts; relevance; reliability

(责任编辑 金 澜)